

基督宗教在華教育事業回顧

Jessie L. Lutz 著

林瑞琪譯

過去數十年，中國基督宗教史及中國傳教史的研究日漸受人重視；對傳教士的文化角色、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回應、以及個別或體制上基督徒的表現等課題，亦有所鑽研。無論大陸、台灣以至海外的學者，都認為有需要勾劃出更精確的輪廓。眾學者也同時重新評價傳教士在中國辦教育的成與敗，得與失。

一九七零年代及八零年代出現的一系列人物和事件，觸發了研究中國基督宗教的興趣。無疑，中美建交是其中的首要大事，接著有中國的「對外開放」及自由化運動。中國基督宗教不單只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幫時代而仍能生存下去，中國教友更能與海外教會進行接觸。四個現代化政策促使中國領導人一再引進西方科技。同治時期的自強運動及本世紀初的西學運動，又從歷史中復甦過來。

中國近年來所重視的實用主義及專業水平，使知識份子有機會重拾過往與西方文化接觸的經驗；對挑選具備良好英語能力出國留學的人選，以及甄選國內研究機關及專業組織的負責人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舉例說，在中國醫學協會、中國科學院的生物醫學組、各醫學院的領導層上，以至在醫學專

業學刊的作者名單中，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畢業生差不多佔了絕大多數。在新一代成長及成熟之前，中國目前在科技上與先進國家所出現的鴻溝，仍有待這老一輩的學者去彌補。

在西方，文化及社會發展史的研究熱潮，帶動了人們對宗教及傳教史的興趣，包括研究傳教史與西方擴張主義的關係等。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正鏗而不捨地鑽研以往中國的傳教士及基督宗教與中國士人的關係。在廣泛地了解過西學東傳的歷史之後，他對中國文化的博大及多元性，深感敬佩。有關少數民族及少數份子團體的專題文章，儒學的專論等，相繼湧現，其中亦包括不少以中國基督徒在中國的背景和角色為題的研究。

自一八四零年代至一九四零年代的一百年不平等關係，構成了濃厚的陰影。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勝利，使中國與美國的關係陷於對立。一九五零及六零年代的全面斷絕來往，留下了深遽的創傷。任何評價基督宗教傳教士對中國的文化衝擊，都流於表面化和情緒化。

中國基督徒今日的自主、自我認識及自我肯定，相信有助於描繪及確認西方基督宗教對中國的貢獻。但西方傳教士以恩人自居的表現，則似乎仍未消除。中國基督教協會

及三自運動的主席、南京金陵神學院院長暨全國人大常委丁光訓主教，在一九八四年明確地否認三自運動是反外籍人士的行為，並指出中國教會是全球普世教會的一部份，與英國教會或美國教會無異。他接著說，「我們只是不願意成為西方傳教史上的附庸而已。」中國三自運動常委之一、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江文漢先生，在一九八一年簡述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基督教會史，不但表示中國基督徒成為了西方傳教士極權下的附庸，也道出了他個人在二十年代作為一個教會學校學生的經驗，連參與愛國學生運動的機會也受到限制。

一九八五年胡振中主教（現已昇任樞機）訪問中國時，表示希望香港的天主教會能肩負橋樑使命，促進在教廷領導下的普世教會與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所代表的中國教會的關係。中國領導人表示歡迎他的意向，同時溫和而堅定地道出恢復接觸的先決條件。有些中華人民共和國天主教徒卻更公開指責梵蒂岡，說它視中國教會為殖民地，又煽動中國教徒反對國家的及共產黨的領導。結果，把忠於國家與忠於信仰置於不能並存的對立局面。

儘管經常出錯及白費工夫，但仍有人不斷埋首於研究及重估的工作。有一位中國基督教學者很滿意於在自己所著的傳教史第二版中，能刪去近半有關文化侵略的章節。西方學者的在華傳教史亦不再斤斤計較於往日的老問題，諸如「我們在中國究竟有甚麼不妥？」或「用甚麼方法可以吸引多一些歸依者呢？」

在重估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價值時，不妨參攷一點個人的經驗。上海、蘇州、成都、杭州、南京以及北京各地，均先後有學

者採用過檔案資料。儘管中國學者經常稱傳教士的工作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但他們已發覺到，事情並不如五、六十年代一面倒批判教會學校那麼簡單。對一些中國學者來說，筆者的在華基督教高等教育史，雖然只是依據在西方社會所能找到的資料而寫成，但亦可作為深入探討這問題的基礎。不過，一旦需要翻譯的話，書名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 - 1950 必然引起問題。顯然，這些教育機構都是由西方教會及傳教組織所控制。在目前中國的基督宗教意義下，他們仍算是基督宗教性質的嗎？在由外來的勢力所主理，並與不平等條約糾纏不清的教育機構內，有人能作出實質的貢獻嗎？這部書的譯名最終可能是「差會大學在華發展史」。

重新衡量基督教大學的角色時，必須懷著嘗試的心情。人和事本身都會影響觀點及取捨優次。新的資料又不斷公開。幾項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將有助於填補教會大學發展史的空白，例如：在抗戰期間輔仁大學及聖約翰大學在淪陷區的角色；教會大學預科班及附設中學的意義；教會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教會大學與中國基督教會的關係，以及基督宗教的中國化等等。對三所天主教大學，即震旦、輔仁、津沽大學的專門研究，是重要的優先工作。無疑，東西方的歷史都會證明目前這些作者所貢獻的價值，但我們仍可以預料會有更具洞見及更中肯的專論出現。

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及歷史學的發展，都有助於我們認識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實際過程。儘管我們所能理解的實在有限，但起碼可以明白到人們向較富強的文化開放時所付出的心靈上代價。我們關注到中國基督

徒歸依者在這個非基督徒的文化中所受的社會、文化及心理負擔。中國歸依者不但被迫放棄很多文化遺產，例如敬拜祖先等，更享受不到一般西方基督徒視為理所當然的環境支持。要求中國基督徒守安息日，他會憂慮這一來怎樣與從不在星期天休息的人競爭呢。毫無疑問，中國基督徒是明顯地脫離了社會其他人的一群。這事情在今日的中國依然存在。

在十九世紀，傳教士來到中國，自以為向外教人帶來真理，作「落後」民族的導師。傳教士對於他們的言行在中國鄉間、文化上及政治上所造成的破壞，很少感到內疚。他們滿以為中國人只是一群有待救拔的迷信民族。為美國傳教士而言，聖堂就是一座可逕通天國的四方建築物，假如有村民反對聖堂的高塔破壞當地的風水，傳教士只會認為這證明他們必須更進一步對抗迷信。傲慢自滿的中華民族是抵擋不了福音的流傳的。傳教士以真理的傳播者自居，自以為直接向更高的權威交代，而無須理會世俗權威的法律。

不過，傳教士很快就發現，絕大部份中國人對他們的宣訊置若罔聞。中國人自信他們具有自己的真理，因此不假外求，無需基督宗教的傳入。十九世紀末期以前，絕大部份中國人對西方社會及其文化仍提不起興趣。他們認為沒有儒家道德觀念的話，還何來文明可言。他們稱西洋人為「夷」或大鼻子。前者表示洋人為未開化的民族，未曾受到儒家思想的薰陶；後一稱呼是針對西洋人的外表而言。在為數不多的歸依者當中，卻有大部份無法謹守由傳教士訂下來的信仰要求，亦有大量的教友流失。傳教士站在他們自己的立場，卻常把傳教工作的平淡反應，歸究於中國人在性格上的缺失。

以教育工作為傳教工具

因此，也許有點出於失望，傳教士開始轉為興辦學校。他們希望藉此吸引著一群聽眾，更藉此與他們維繫穩定的接觸。站在街頭向東來西往的行人傳教而得不到甚麼結果之後，傳教士希望學生會願意奉教。基督徒的子弟當然不可以進一般外教的學校，受儒家思想的衝激。建立一個基督徒社區可能有助於維繫基督徒。因此，早期的教會學校常被視作傳教工作的後援。美國基督教會方面，教育工作與教會工作息息相關，已成為不易的特色。由於以聖經為信仰的中心，基督教信眾對文學特別重視。早期很多美國大學是專門為培訓神職人員及其他專業而設。儘管有些傳教士及傳教差會反對把傳教經費移作教育之用，但很多傳教士卻視教育為他們的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天主教修會團體同樣興辦了不少學校，但一如其他在華傳教的工作，在同一件事上，天主教與基督教有截然不同的做法。兩者之間所用的不同言語，多少可以說明他們的差異。他們不單用不同的中文字去表達 God 及 the Holy Spirit 等概念，連教派名稱也有不同含義：一方是「天主教」；另一方卻是「耶穌教」。天主教倚重獨身的神父、修士、修女；而基督教大部份牧師卻是有妻子兒女的。由於十九世紀在華的天主教及基督教傳教士彼此鮮有往來，因此下意識會以對方為潛在競爭對手。很多中國人都以為他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宗教，而不知道他們是來自同一的信仰。

天主教教士通常喜歡向整個家庭傳教，而較少注重個人的歸化經驗。天主教修女大力推行哺育孤兒的工作，讓他們在基督徒的

環境中長大，並盡早安排他們與其他教友結婚。因此，很多天主教學校都是小學階段或是以要理學校的形式存在，而不大著重高等教育。雖然在國內有不少專為有志修道者而設的神學院，但大部份神職人員要深造時，卻往往會遠赴羅馬或歐洲各地。在二十世紀初期，天主教中學及中學生數目的確有顯著的增加，其中有些中學且達到大專院校的水平，但天主教修會在大學教育方面的發展卻十分緩慢。三所天主教大學的創校日期分別是：震旦大學一九零三年，津沽大學一九二三年，輔仁大學一九二五年。如同基督教大學一樣，他們在一九三七年以前的招生人數仍極為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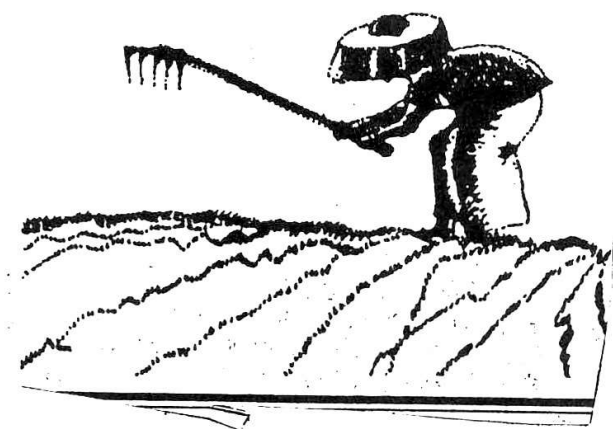
一八五零至一八九零年代，可說是中國教會學校教育的第一階段。當時期的教會學校是人們在失意於正途之後，勉為其難的選擇。當時的正途是研讀儒家學說及注疏，準備考取功名。最後目標是打開仕途，在政府中任職。由於精通儒家學說及熟讀儒學正統思想在科舉中甚為重要，因此課程大都偏重

在人文思想方面，數學、科學、社會科學及專業訓練幾近於零。在教會學校方面，聖經及基督宗教科目當然佔有重要地位，西方科學、數學、歷史、文學及地理，都全在課程之內，而英語更是愈來愈受重視。

不過，教會學校亦重視傳統儒學的教育，以提高識字程度。低年級的教會學校學生，經常用了大部份時間在「三字經」、「千字文」及「百家姓」等傳統啟蒙讀物上。儘管傳教士常批評這些書的課文及教學方面欠缺效率，且內容充滿異教意味，也儘管傳教士力求以基督宗教思想取代這些古老的課文，但在十九世紀的教會學校裡，仍不得不大量起用那些依賴傳統讀本及教學方法的書齋先生。當教會學校的學生能修習四書五經之後，會學習如何圈點及批注古文及儒學之不足。在學生掌握基本寫讀技巧及西學更受重視以後，教會學校與傳統書齋的分野才更見明顯。

在學制及課程上，兩類學校彼此截然不同。由於國家沒有指定劃一的小學教程，所以大戶人家都會聘用私塾來教導仔們的子女。一位老師教一位學生，因著他的資質進度而施教，而不是按著一套既定的教程。但是，教會學校卻是按著班級制度，設立了一套施加在所有人身上的標準教程，從甄別試的成績來確定學生的進度。學生在經歷這個制度之後逐步邁向畢業並領受學位。在傳統私塾內，無論老師本人或是校方，都不會發給學生畢業的證明。資質高的學生，可以追隨碩儒論學。而科舉考試有點兒類似畢業，但這與私塾本身是完全分開的。

私塾的課程，完全按個別學生的需要而定，通常在大戶人家的住宅內或宗族祠堂內關室上課。但傳教士辦的學校，則喜歡自設



校舍，與社會分開。在某些學校昇格為專上學府時，更要求有自成一格的校區，具備行政大樓、宿舍、飯堂、課室、小聖堂、診所、課外活動設施等等。這些學府多數位於市郊，與中國人的心智及政治活動分開。

在二十世紀以前，大部份有抱負的學生對這些基督教學府仍不大感興趣。他們的目的是進入仕途，而教會學校所提供的中文教育，並不足以使他們在科舉中及第。教會學校與傳統私塾背後各自所懷的意識型態，也令到兩者的對立更趨尖銳。雙方都以灌輸「正統」思想為己任，教會學校大力宣揚基督教義，而傳統私塾則全力維持儒學地位。因此，可以理解到何以教會學校在十九世紀進展十分緩慢。學生人數不多，且並非來自顯要家庭。到一九零零年為止，全中國共有約二千所基督教學校，其中大部份為小學，中學約有四、五十所，另有六所具備大學或專上學院地位的學府。全部學生總數約為四萬，雖不算少，但較之全中國龐大的學生隊伍而言，仍是微不足道。儘管超過四份之三的中國人口居住於農村，但大部份教會學校卻是開設在城鎮裡。實際人數上，天主教學校的學生多於基督教學校，但他們多數是在小學或主日學的水平。除了一些中學外，在一九零六年間，六十四所大大小小的修院，共收納了一千六百四十名修生。

雖然教會學校只是處身於社會邊緣，但仍能發揮多種不同的功能。由於十九世紀的教會學校收費甚低，甚或完全免費，這使家境清貧或無力負擔子弟考取仕途的家庭，有機會在社會中求上進。教授英語的學校在這方面尤有作用。進入二十世紀，由於社會朝向多元化發展，對不同技能的人有更大的需求及重視。教會學校的學生就業機會大增，

可以為政府機關或辦洋務的商行擔任翻譯或傳譯，在通商口岸為外商擔任文書或紀錄員，為洋商擔任買辦或中間人，甚或為外國人家家庭打理家務。社會的多元化，也帶來了新聞業、現代銀行業、商務法律及機械工程等新的行業。

有些學生明白到，他們所學的科技及數學知識，有助於在新的政府機關中站穩地位，如在電訊局、鐵路管理局、海關及海軍機關中。由於他們沒有循科舉出身，一般來說不會掙到決策階層。但雖然是沒有功名的人，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卻不斷提高。有一部份人士更能成為如李鴻章等洋務運動大員的忠實幕僚。由於他們通曉外語及西方風俗，二十世紀初的教會學校學生差不多滿佈整個外交界。以教會學校為踏腳石轉赴海外留學者，更大不乏人。

傳教組織當然亦樂於聘用本身培育的畢業生，他們常在基督教醫院、孤兒院、教堂及學校內工作，擔任的職務由教師以至廚子，由牧民助理以至門工皆有。那些在高中或大學畢業的學生，不少更投身傳教工作行列。

在某幾方面，基督徒教育家開創了時代的先河。其中一項是完整的女子教育。行文至此，仍是男性主宰的天下，男女角色無法互相替代。理由很簡單，女子沒有機會參加科舉考試，因此之故，傳統中國教育並不重視女子培育。某些富裕人家會讓他們的女兒在男孩子上課時旁聽，但人們並不視學問為女性的優點，相反，他們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傳教士的妻子及一些獨身的女子，力倡女子學校，作為整個教育體系中的一部份。雖然很多女子學校都偏重於宗教課及家政課，但辦學者仍強調女子學校不但合法，且亦合乎水準要求。傳教士爭取婦女教育的理由

，與日後國民黨所持的論點大致相同，就是「教育母親，可決定下一代的價值觀念。」教會中學常為自己開創新的局面。基督教傳教士也是率先在中國開辦女子專上教育。華北協和（基督教）女子書院的畢業生於一九一九年成功爭取進入國立北京大學之後，中國的大學開始接受男女同校。即使在國民政府開放了婦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之後，基督教學校在提供婦女教育機會的工作上，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雖然以二十世紀末期的水平看，女傳教士在當時仍算不上是積極鼓吹婦女解放，但她們的獨立自主，卻為其他婦女的出路提供了很好的榜樣。獨身的女傳教士被稱為「雌老虎」，多少也反映出她們的形象。她們在傳教事業上誨人不倦，及對社會的責任感，引發起在教會學校畢業的女子追求深造或找尋職業的信心。與傳統中國同學相比，早期教會中學的女畢業生對傳教事業也多懷一份關心。

基督教宣教士在向中國引進醫療及牙醫教育方面，亦有一定的貢獻，建立了標準的醫生及護士證書制度。誠然，滿清皇朝並非沒有生理或心理方面的醫療設施，但現代醫院的概念，比如：與外界隔離的病房、受過專業訓練的護士、手術室、醫生的專科診治等，為中國都是新鮮的事物。醫療傳教士在開辦醫院之後，立即發覺急需聘用輔助人員，因此在業務工作中也著手訓練一些中國籍助手。先是非正式的醫務教學，後來也把正式的專業醫學教育引進到中國來。由於男女之防，中國婦女多不願由男性醫生診斷，因此女醫生的需求大增，而在西方社會女性習醫尚未成為風氣之前，中國已有龐大的女醫生隊伍了。醫療傳教協會與新成立的中國醫

學協會合作，在中國推行醫學證書制度。無論是個別醫生或是醫院方面，都需要護士的協助。雖然人們仍免不了視護理工作為傭僕的幹活，但天主教修女及基督教醫療傳教員的精誠工作，和中國護士協會的成立，以及現代醫學上的需求，都促使護理業能在中國成為一項專業工作。

傳教士家庭的生活及工作方式，使人有機會一睹西方文化在日常方面的種種特色。儘管他們不一定是最好及最少偏頗的文化媒介，也儘管他們可能只是接觸到一小撮中國人，但他們卻著實是歷史上極具價值的文化媒體。他們撰寫及翻譯教材，即使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翻印了多少書籍，但從革新派人士及公立和私立學校的藏書來看，也可略知一二。據學校及教科書委員會和基督信仰及常識傳播學會的報告，一八七零年代及九零年代，書籍的銷量都有顯著的增長，數學及科學書籍尤甚。

由於傳教士印行了一般非宗教書籍，因而建立了科學、醫學、地理等科目的詞彙體系。但在抽象名詞、化學元素、生物及解剖學術語以至地名等方面的中文翻譯上，卻充塞著一片混亂，以致如阿拉伯、澳地利亞、加爾各答等地，竟有多至四個不同的譯名，而化學元素所用的代號也各有不同。傳教士教育家最後成立了一個詞彙委員會，發起統一詞彙的工作。這項工作充滿爭議且耗時甚鉅，以致要在二十世紀由政府及專業組織接辦。

傳教士的個人接觸、出版物及生活方式，有助於改變中國人對世界及整個人類的觀念。傳教士藉著教育工作，使中國的有識之士明白到，雖然世界其他地方並不奉行儒學，卻和中國是同樣受到尊重的。傳教士成了

突破中國地域隔閡的力量。不過，他們在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同時是一些不快及對立事件的根源。婦女教育及她們投身社會上各種專業的機會，對現代社會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事。但並非所有中國人，無論男女，都歡迎這種轉變。傳教士必須經常警覺到，無論他們所接觸的是社會上如何有影響力及有活力的一群，他們最終只是中國整體人口中的極少數。傳教士的角色也有不良影響的一面，促使人們對西洋外來的產物出現反感，並因怕失卻傳統及個人地位而產生抗拒態度。

由於改革及革命運動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蜂湧而來，在中國的基督教教育工作也進入了新的時代。從一八九零年到一九二零年間，教會學校又因另一些原因而大受歡迎。不但投考者超乎招生額，不少學子更來自名門望族，他們畢業之後大多成為教師或顧問人員。一九零五年，滿清政府放棄傳統的科舉制度，開始過渡到西式教育體制。研究儒學再難成為投身政界的敲門磚。有上進心的青年紛紛在國內或赴海外接受新式教育。這時候，中國全面向西方及日本開放，而第一個全國教育方案亦是襲用日本模式。而事實上傳教士學校在中國是現成可用的，他們已印備教科書，且早已開始使用。為負擔不起放洋留學者，教會學校為他們提供了西式教育。年青人願意為學而付出的代價，就是願意接受教育工作及參與教堂禮儀，儘管他們可能根本對基督宗教全無興趣。

二十世紀飛快發展

為準備留學歐美的人，教會學校讓他們有機會在中國學到最好的外語。很多「學成歸國」的學生領導，在國民政府中迅速獲得

高職，也令到教會學校的語文教育需求不斷增長。聖約翰大學及其附中，亦因為畢業生能通過「庚子賠款」的考試而留學美國，因而聲名大噪。復旦傳教士及其他北京、上海、山東等地的天主教高等學府，為有志留學歐洲進修者提供學習法語及德語的機會，使法律及醫學等科目、成為熱門的學科。

因此，教會學校有機會不斷發展並提高本身的地位。一九二零年，基督教招收了二十萬名中小學生，另外，二十所專上學院的學員合共略超二千人。天主教學校方面的數字，在一九二四年共有二十五萬九千名，當中絕大部份是小學生，中學以上程度者不及六千人。當然，相對於全中國的學生總數而言，教會學校學生只佔一個極小的數目。前赴日本留學的人遠較赴歐美者為多。雖然基督教大學的學生人數在一九二零年至二五年間增加了一倍，但仍只及政府大學學生總數的八份之一。

從零散的資料可以看到，基督徒在中國的改革及革命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使政府變革而最終在一九一一年以民國取代滿清皇朝。重要的革命家或維新派都閱讀傳教雜誌及譯刊，而有很多人更與傳教教育家十分熟稔。梁啟超與李提摩太在一八九五至九六年間多次見面，梁啟超、康有為及宋友仁似乎對李提摩太的中文著作及林樂知（Young J. Allen）所編的「萬國公報」極有興趣。好些積極投身中國革命運動的人，都是歸依基督宗教或在教會學校畢業者，孫中山先生正是其中的表表者。也許大部份革命家的名字經已失傳，亦有些人不願公開談論他們個人的信仰。但有些參攷資料卻可以讓我們相信，在同盟會內有不少基督徒或接近傳教教育家的人士。可能因為基督徒多為社

會主流思想邊緣的人士，他們會感到較容易摒棄一些傳統觀念，也容易擺脫既有的思想架構。不過，這點目前尚未能下任何定論，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二十世紀初期，教會的社會福音工作備受讚許。社會福音工作力求使中國社會福音化，並深信基督徒慈善工作受基督化的社會環境，可以緩解歸依者在社會上的不安。他們呼籲加強教育工作，特別是師範培訓。他們所持的觀點是，雖然只有一部份基督徒學



生會留下來，但其他往公立學校任教者，也可以在自己的教育崗位上發揮影響力。基督徒參與了反對纏足、娼妓、納妾、殺嬰、童工、抽鴉片煙等社會問題，藉以反映出基督徒信仰的道德觀。他們設法使人相信，基督宗教就是對中國社會的服務。他們不斷加強普羅教育、消除文盲運動、賑濟饑荒、教育

盲聾人士、安置痲瘋及精神病患者，這一切都為社會服務立下了理想的模式。基督教青年會所推行的群眾教育計劃，也許是最廣為人知的社會福音工作。但他們亦深知，正如其他活動一樣，在活動範圍及效力上仍有限制。

由於教會不涉及政治權力，也不是全國性學術機構，因此能有更強烈的社會意識，並協助個人的發展。以基督教女校為例，他們一般都以放棄纏足為入學條件之一，因而使這項早已引起上層社會注意的運動推行得更加有效。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天主教青年會以及其他眾多的基督教青年團體，紛紛開辦夜校，使數以百計工廠工人脫離文盲行列。他們為上海工人的子女提供康樂設施，組織健康教育班、營養班、預防皮膚病班等等。社會改革運動在整體上實有賴政府的參予才能得到全面的革新。通常最具深遠影響的，倒是參予的學生本身。教會學校的畢業生常懷念他們的母校、老師的誠懇、關懷及啟迪，以及在參予社會服務時所建立的友誼。在一九四零年代，一些基督徒可以接納共產黨領導人，因為表面看來中國共產黨有意亦有能力實踐福音的社會精神。三自運動的領導人就是出自這些基督徒。

基督宗教教育的美景在二十年代，因國民政府決心統一全國及實現主權而中斷。中國的愛國人士認為教會學校的存在侵犯了國家主權。他們認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在境內應有權整頓各級教育工作，而教會學校卻是完全獨立的自成體系，自定課程，並自行頒授學位。他們認為這是不平等條約的遺物，應予取締。他們覺得教會學校是治外法權的延伸，掛著外國的旗幟自成壁壘。由於他們認為宗教與科學是互不相容的，因此教會學校

被視為重建中國的障礙。經常有人批評傳教士以教育為餌，誘人信教。而教會的教育方針，也是朝著這方向走去。國民黨人攻訐教會學校為文化侵略。教會學校在行政上、經費上、教學氣氛以至教學內容上，都是採用外國式的。教會學校學生對華盛頓及拿破侖的認識，多於對中國民族英雄屈原或蘇武。教會大學的畢業生，寫起文章來，用英語較諸用古典中文流利得多。總括一句，教會學校學生欠缺中國心。

對立問題的核心，其實在於西洋人與中國人的不平等關係。在教會大學裡，有雙重的支薪標準，房屋及其他福利方面，都是中外有別。所有大學校長及絕大部份系主任都是外籍人士。由於大學的經費主要來自外國的基金會，因此中國籍教職員對校務的影響力，遠低於他們人數上及職位上的比例。大部份場合是外國人擔任老師或施惠者，而中國人則成為學生或受惠者。無論是信不信基督宗教的中國人，都對這種關係感到不滿。而個人的接觸經驗更增加了憤懣。教會學校學生被批評為數典忘祖，因為他們接受了西方的生活習慣、衣著、思想架構；但也有學生因為對不平等現象感到氣憤而更具民族主義感。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二零年代的愛國運動中，不少參加者是教會學校的師生。

年青的知識份子組織起反基督宗教聯盟，發動了反基督宗教運動，要求教會學校向政府登記，放棄校內的宗教要求，並以中國籍教職取代外國人的領導地位。他們呼籲教會學校學生參加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及北伐行動，以表現愛國心。反帝國主義的愛國主義浪潮聲勢十分洶湧，無論傳教士如何不涉及政治，但仍不能否認基督傳教工作與西方的擴張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

傳教工作的全盛時期，適與不平等條約完全掛鉤。

既然了解到群眾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所以無論國民黨、共產黨，以至中國青年黨，都認同反基督宗教運動。他們發出指令、宣傳刊物，籌集基金。他們時常延攬反基督宗教聯盟和宗教權利協會的支會加入自己的黨派或青年團。傳教士教育家及其家鄉的傳教委員會，對中國愛國運動缺乏認識及反應遲緩，都加劇了對立的程度。傳教士不慣於接受學生的挑戰，且成了常例地強調學術上的要求比政治或愛國活動更重要。一九二五年的學生運動令到多所基督教大學陷於癱瘓。這些運動深受全國學生聯盟及多個政黨所支持，但原動力卻是來自基督教大學學生本身。為了抗衡聖約翰大學，很多教職員及學生都退校，另行組織一間新的高等學府，光華大學。

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間的北伐行動，促使大批在內地工作的傳教士離開崗位，他們要不是關閉校門，就是把學校委託予中國籍的基督徒領袖。國民黨掌政以後，激進的學生運動及政治上的極端活動偃旗息鼓。中國共產黨及共黨青年團轉入地下活動。政府中才俊中不少是基督徒，教會大學才再次享有影響力及受到歡迎。

二十年代末期，中外人士都認識到，有必要把中國基督教教育中國化。雖然這項工作直至一九四九年共產政權成立時仍未完成，但在三十年代確曾得到長足的發展。大部份的教會學校都在政府教育部註冊備案，且接受國家在學制、課程、頒授學位等各方面的規定。學生必須參與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活動，但宗教活動則純是自發性的。雖然西方人士因著西方的資助而能影響決策，但中



國人在行政崗位上卻佔了大的比例。研究資料及數字顯示，在社會學、政治科學及歷史等方面，教學內容已開始中國化。當然，其中不足之處及有待改進的地方仍多，但起碼有很多地方是繼承了中國的傳統而非仿效自西方社會。

許多早期的科學考古工作，都是由基督教大學的畢業生或教授所主持。基督教大學贊助了多項劃時代的研究工作，包括土地租賃情況、農民收入及生活預算、家庭及鄉村結構等。他們也專注於一些中國特有的問題，如寄生蟲病、蠶蛾病毒、黑穗病等。就連在建築工程方面，也開始中國化。金陵大學的重簷鉅椽，及燕京大學的寶塔式水塔，都可以引為例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燕京大學的反日運動，正好反映出教會大學的學生與中國知識份子的主流思想具體地結合在

一起。

不過，美中不足之處實在仍多。精通中文及中國文學似乎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其中部份原因是對中文感興趣的師生大多選擇公立的大學。拓展機械工程科目的計劃一再因為耗費過鉅而擱置。雖然教會大學在農業、醫療、護理等各方面有重大的研究成果，但流傳範圍卻十分有限。教會大學畢業生加入神職行列的並不多，所有教會仍舊要依靠大量外籍牧師或神父。在基督教方面，有時他們會起用一些教育水平並不突出的中國籍牧師，但他們勢難向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宣道。教會大學奉教學生的人數持續下降，加上自願參加宗教活動的人實在為數甚少，使教會學校的本質及作用均受到質疑。

所有教會學校都高估了中國基督徒的承接力而過份擴大學校的架構。在強烈的挫敗感之中，傳教差會得面對一項兩難問題，如何充份運用教會有限的資源呢？大部份人都不願意離開他們所投身的教育事業，而任何人建議消除教育部門，都會遇到教會大學當事人的強烈反對。大勢所趨是分散資源，避免集中在少數項目上。背道而馳的例子是，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所支持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專注於研究及訓練工作，只培養了數十位醫學博士。那些要求大量培育較低層醫療工作者的人士，則批評協和醫學院的做法是為一少撮精英服務，而忽略了大眾的需要。

抗戰時期艱苦經營

一九三零年代，基督教大學歸納入全國教育體系內，佔學生總人數百分之十二至十五。雖然教會大學的條件略勝於省立或其他私立大學，但在設備及師資上，卻遠遠不及頂尖的國立大學的水平。不過在某些學科方

面，他們仍佔有領導地位。他們促進了音樂、圖書館學、牙醫護理、新聞學、農學、體育、考古學及社會學各方面的專業培育。這幾方面的研究及教學工作，都有鉅大的貢獻。近年東西方的大學重新建立這幾方面的學術合作，正好證明教會大學在這幾方面的成就。教會大學對女子教育堅守不渝，同時也重視醫護人員的培育。透過外語教學，教會大學也為社會上少數精英份子提供晉昇機會。

日本侵華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帶給教會學校新的挑戰，各地的回應方法也有所不同。很多教會大學都追隨國立大學的做法，向中國大後方撤退。按國民黨的立場，大學生將是戰後為國服務的精英。教職員及學生都努力在困苦之境況下勉力繼續上課，同時兼且參加救濟工作。藉著外國關係的保護，很多教會大學的校園都成了中外難民的避難所。在中國西部，向大後方撤退的慘烈景象發生又再發生。教會大學的存在，有助國民黨重慶政府維持財源及操守。不過，雖然大戰期間，紀律及士氣急遽潰敗，但這類消極性的報導卻很少公開。很多西方的贊助人士，對國民黨在四六至四九年國共內戰期間所表露無遺的多年積弱，全然沒有心理準備，因此在如夢初醒之際，除了失望之外，更帶有被出賣的感覺。

在淪陷區，有些教會大學借用外國關係來維持局面。一九二零年代以來，教會依仗不平等條約去爭取某些方便的做法一直備受批評，但諷刺的是，這一下子倒為那些不願在日軍壓力下到中國大學就讀者，提供另一條出路。燕京大學門口掛上美國國旗，能在北京一直維持至一九四一年為止。嶺南大學在一九三八年以後，與香港大學合作，曾一度擴大學額至八百人。上海大學遷回蘇州原

校舍的計劃告吹之後，與杭州大學一同併入上海國際安置區的基督教聯合大學。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國參戰，美國的治外法權及中立地位至此告終，所有賴以生存的大學，要不是關門，則是轉入地下繼續教育工作，或向大後方撤退。在其後幾年間，他們為華東學生的服務迅速增長，他們所能提供的資源遠遠追不上學生人數的增長。有些學生為了表達民族思想，發表聲明反對在校園內散佈日本文化及價值觀念，這也有利於基督教大學的發展。

一九四一年以後，輔仁及聖約翰大學仍是中國東部能維持一定程度自主的主要私立大學之一。儘管不滿於某些委曲求存的妥協手法，青年人仍踴躍加入這些學府。即使加設暑期特別班及夜校，仍然求過於供。申請入讀天主教大學的學生，由一九三六、三七年度的三百九十五人，急升至一九四一年的10669人，其中輔仁大學獨佔了六千多人。一九四一年以後，申請入學的人數壓力，使校方無法兼顧維持學術水平。這些戰時學生的成績尚待進一步研究，但無論條件如何不足，似乎他們當中在戰後，有相當多的畢業生能在國內或海外廁身於本行的高位中。

戰後的中國是一段政治不安、經濟困難、內戰頻仍的時期。所有恢復正常生活的希望及期待，都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紛爭中斷送了。共產黨既主持了使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決策，教會學校再無需要，也再不可能在經濟或社會革命中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國家既已全面包攬一切社會服務工作，教會所能做的便完全局限於宗教活動方面。絕大部份傳教士都離開了中國，其中有些在中國介入韓戰之後，背上了為自己母國當間諜的罪名。教會學校被指為多餘的，並含有顛覆成份

。政府把所有教會學校都併入全國的教育體制內，教會學校不再有自己的特色，卻得以完全中國化。

在共產主義重新體現政治及國家主權，且收回所有社會服務活動及進佔教會學校校園之後，教會大學仍舊為社會作出一定的貢獻。基督教會內的中國籍領導層經已成熟，足以支持教會渡過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幫統治的艱苦時代。儘管中國基督教界一直苦於缺乏知識份子領袖，但基督教學校的畢業生卻的確為「三自運動」預備了人材。目前，他們正為能過渡到無宗派區分的時代而引以為榮。而在中國天主教會的領導層逐漸老化之時，熱心的教友都希望祝聖年青的司鐸及主教以施行聖事，儘管北京與教廷仍未能建立關係。

即使在今日，很多從教會接手過來的學校，仍強調他們的基督教背景。南京師範大學前身為金陵大學，他們在音樂、體育及師範方面特別出色，可以引為一例。燕京大學的傳統重點科目新聞學，促使北京大學與美國米蘇里大學建立正式的學術合作。一九七九年法國耶穌會教授應邀到復旦大學任教。在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委員會的協助下，武漢再度成為中國的圖書館學核心學府。其他類似的例子仍多不勝數。不得不提的是，中國協和醫學院最近傳出有意再次起用曾引以為榮的「基督教協和醫學院」這個舊名。

移往海外的教會大學也應在此一提。雖然這些學府現在全是由中國人掌管，但他們仍力求保存辦學前驅者的特色。以在台灣的東海大學為例，他們仍要求學生在一般學術培育之外，有基本的美術修養，儘管大部份的國立大學都已不再這樣做。台灣輔仁大學設有哲學博士班，且維持了昔日在北京時代

的重點學科。蘇州大學在經濟學、電腦科學、商業管理及法律學上的發展，都是建基於往日的成就上。

過往數年間，大學校友會在中國紛紛恢復。加上國內大學與海外大學重新建立聯繫，促使人們討論教會大學的海外復校與國內復校之間聯繫的可能性。在這方面已有不少使人感興趣的聲明先後公佈。聖約翰大學的海外校友與國內校友最近的團聚，似乎說明了在基督教大學畢業，不再被目為背離中國的事。校友聚會中也提到一項基督教大學的優良傳統，就是在校園內的友愛氣氛下所培植的良好師生關係，以及身為學生要明白到他們是社會的幸運兒，自當有義務為國家及社會多作貢獻。宗教本質倒是較少提及，不過，這也許是因為教會大學的特色是在現世事務上把基督徒的價值觀念表現出來。另一種看法是教會大學最重大的使命，是把儒家思想中社會領袖的責任，與人民的福祉融合起來。

誠然，在重修關係當中，仍夾雜著不少緊張和困難。他們的動機當中，究竟尋求海外財政資助的動機佔幾多呢？在西方的學術機構及個人方面，除了當然的動機，即宣示基督宗教的愛德之外，其他動機又佔幾多呢？

在中國大陸，以教育為傳教工具已不再可行。目前的政治權力以下，再不容許以興辦教會學校以吸收歸依者，或使人在基督宗教處境之下接受教育。早在利瑪竇時代，傳教士已希望藉著引進科學、科技及社會服務，打開通往中國的坦途。使中國歸依基督這項首要目標，只得到極有限的成功。在現政府的嚴格限制之下，似乎中國基督宗教的前景，得完全依賴國內的信眾自己的努力。很多中國基督徒亦認為這才是應走的道路。